

传统文化与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CHUANTONG WENHUA YU MAKESI ZHUYI LILUN YANJIU

戴丽红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传统文化与中国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

戴丽红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戴丽红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81114-282-1

I. 传... II. 戴... III. ①传统文化—理论研究—中国②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中国 IV. G12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082 号

传统文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戴丽红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邮编: 610054)
责任编辑: 张克铃 谢应成
发 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测绘队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114 - 282 - 1/G · 87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 (028)83201495 邮编: 610054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文化的当代思考	1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
一、尚和、贵中、求变的民族精神	2
二、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6
三、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高	9
第二节 《周易》与与时俱进思想	13
一、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代同步发展	14
二、量时制变，随物而动	17
三、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发挥主观能动性	20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进与退、趋与避的关系	22
第三节 《周易》与和谐思想	25
一、“太和”境界	26
二、人与自然：同化还是异化	29
三、中和追求	33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38
第一节 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研究	38
一、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与其他思维方法的关系	38
二、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历史渊源	48
三、多维视野中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	67
四、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客观基础	82
五、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与实践	87
六、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作用	8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93

一、实践的品质	94
二、创新的品质	95
三、开放和兼容的品质	98
四、不怕挑战，在斗争中完善自己的品质	100
第三节 知识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兴起的历史必然	103
一、知识经济的基本内涵	104
二、知识经济兴起的历史必然	108
第四节 当代大学生对“与时俱进”的认识——来自成都 信息工程学院的调查报告	110
一、大学生对“与时俱进”概念的理解	110
二、大学生如何做到与时俱进	113
三、对“与时俱进”时代意义的认识	115
第三章 邓小平理论的价值与意义	117
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抉择	117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117
二、邓小平明察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	119
三、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战略抉择	120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121
第二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大解放	122
一、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22
二、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邓小平南方谈话	125
三、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党的十五大报告	127
第三节 依法治国——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精神实质	128
一、坚持“法治论”，反对“人治论”	129
二、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131
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132
四、提高国民素质与法律意识	135
五、依法治国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	136

第四节 邓小平的思维创新	137
一、全局思维	137
二、特色思维	138
三、批判性思维	139
四、辩证思维	140
五、开放思维	141
六、实践思维	142
七、民本思维	144
第四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索	145
第一节 “三个代表”的现实针对性	145
一、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145
二、针对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存亡的惨重教训	147
三、针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148
四、针对复杂国际斗争形势	150
五、针对党的三大任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	152
第二节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154
一、德治与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154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159
三、德治与法治并举	164
第三节 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167
一、三个文明的提出	167
二、三个文明的概念	169
三、三个文明的区别	170
四、三个文明的联系	173
第四节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176
一、“政治文明”概念的内涵和要求	176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	177

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181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	185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185
一、协调发展	185
二、以人为本	187
三、人的全面发展	188
四、可持续发展	189
五、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191
第二节 超越——科学发展观的当代视野	192
一、理论超越：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192
二、实践超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航标	197
三、历史超越：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华文明的新贡献	200
四、时代超越：科学发展观是 21 世纪现代文明的新结晶	203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与高校的科学发展	206
一、当下高等教育与科学发展观的背离现象	207
二、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路径	209
第六章 和谐社会的构建	216
第一节 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16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历程	216
二、和谐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要求	220
三、和谐体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要求	224
四、和谐体现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质要求	226
第二节 和谐——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诉求	229
一、人与家与国的和谐	229

二、城乡的和谐	230
三、人民的和谐	231
四、文明与文化的和谐	232
五、民族与社会的和谐	234
六、道德与法律的和谐	234
七、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的和谐	235
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236
第三节 新时期多校区办学高校教职工内部的文化矛盾及其对策	238
一、教职工的文化矛盾的主要表现	239
二、正确处理文化矛盾必须坚持的原则	243
三、解决文化矛盾的主要对策	246
第四节 和谐心态——大学生的成功之道	248
一、和谐是一种品质，一种价值取向	248
二、和谐心态的特征	249
三、和谐心态与大学生的成功	253
第七章 思想道德建设刍议	258
第一节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	258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变化	258
二、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变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61
第二节 大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价值导向	265
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人生观的基本问题	265
二、正确认识人的本质	271
三、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	274
四、在建设市场经济中把握正确的价值导向	277
第三节 心理健康与正确认识自我	280
一、心理健康的特征	281
二、正确认识自我	283

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	287
一、职业道德价值取向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288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理性道德行为	289
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职业道德遗产	293
四、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有价值的职业道德成果	294
第五节 大力加强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96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297
二、应对的措施	299
第六节 司法工作者的道德修养	304
一、司法道德修养的涵义	304
二、司法道德修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305
三、加强司法道德修养的举措	306
第七节 高校师德建设的政策导向和舆论导向	310
一、高校师德建设的舆论导向	310
二、高校师德建设的政策导向	316
第八节 中西方师德建设比较研究	321
一、中西方师德要求比较	321
二、中西方师德培养方法比较	326
三、中西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比较	328
四、中西方师生关系比较	330
五、中西方教师评价制度比较	332
主要参考文献	335
后 记	338

第一章 传统文化的当代思考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本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秦亡汉兴，统治者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省刑薄赋，与民休息，并积极营建新的上层建筑。几经反复，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其标志便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独领风骚两千年，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儒家思想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过去，我们批判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垃圾，是钳制中国人思想的枷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日趋活跃，人们开始反思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为什么儒家思想这么“顽固”地“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为什么世界上许多曾经灿烂一时的文化都相继中断甚至消亡了，而中华文化却薪火相传，永不衰竭？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胜利走向胜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新的盛世辉煌，而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用科学的精神思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研究。下面从文化的角度对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尚和、贵中、求变的民族精神

“和”，《说文解字》解释为“相应也”。《诗经》中“和”字出现过几次，如“鼓瑟鼓琴，和乐且湛”^①。这里的“和”，即应和。在先秦，道家对“和”也有研究，提出“和”和“天和”的概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庄子说：“天和将至。”^③可知，道家更多地倾向于自然方面的和谐。而儒家则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如《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先秦儒道两家都把天人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只是有的侧重天道，有的侧重人道。《易传》作者综合儒道两家的和谐思想，提出“太和”这一范畴。《乾·彖传》有这样一段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大和即太和，是一种最高的和谐。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太和”境界既是自然界本然的秩序和发展的归宿，又是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实践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无疑是先秦各家对整体和谐的最完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最高的价值理想。

这种尚和的思想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比如，在音乐中，和，是尽善尽美，美与善达到完美的统一。孔子云《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又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④。《礼记·乐记》：“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在君子那里，和，是文质彬彬。在人际关系上，和，则

① 《诗经·小雅·鹿鸣》，[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老子》四十二章，任继愈《老子新译》第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庄子·知北游》，曹础基《庄子浅注》第32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论语·八佾》，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体现为“仁”，即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和，是国泰民安。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和，是万国咸宁，万邦协和。在个人的德行修养方面，和，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②在社会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方面，和，是“群龙无首”。^③在商业运作方面，和，是和气生财。在军事战略方面，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④在知行关系中，他们注重的是“知行合一”；在宗教关系上，他们力求“三教合一”；在情景关系中，他们侧重的是“情景合一”；在天人关系中，他们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等等。

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和，不仅是观念和心态，而且是一种组织和能力。和，使不同的事物各得其所，相协调而发展；和，是使不同人、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统一起来的本领。比如，“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龙本身并非实有的一种动物，它是综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创造出来的，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别的动物的重复，而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动物。可见，龙是一个“和”的民族图腾。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同化之后的产物，是一个“和”的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民族融合，都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发展生机和繁荣。儒家文化的这种“和”的精神品质，使儒、释、道三家各异其旨的学说能相互容忍甚至相互吸纳，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在中国历史上有盛唐雄汉的赞誉，其实，这和这两个朝代以开放的和谐心态与世界文化近距离接触有关。在汉唐，中西方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著名的“丝

① 《论语·八佾》，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孟子·公孙丑上》，杨伯峻《孟子译注》第6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 《易·乾卦·用九》，[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④ 《孙子兵法·谋攻》，《诸子集成》（六），中华书局，1954年版

绸之路”就是这种交融的历史见证。

和的同义词有很多，如和气、和平、和谐、和睦、和解、和缓、和善、和蔼、融和、温和等，而儒家的“和”并非一般的“和”，它必须符合“中庸”之道，才是一种优秀的“和”，也即“中和”。过去，在极“左”的年代我们曾经批判“中庸”，认为，“中庸”是搞折中主义，是不讲原则，不思进取。其实这是对“中庸”思想的歪曲。“中”指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是指平常，是要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实用。而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执两用中”。“执两”就是把握事物的两端，也就是明白矛盾的两个方面。“用中”就是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找它们的统一、和谐与平衡。这才是儒家的“中和观”。与“执两”相对的就是“执一”。“执一”就没有“中”，而只有片面性。所以，《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应该看到，儒家所言的“和”不仅是“和谐”，还是一种方法和原则。它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追求和谐体现的是一种开放的性格。因为和谐是反对“同”，强调的是不同之间的统一性，追求的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这里的和与同，看似很接近，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和是各种不同因素的统一，是新质的创造；而同则仅是相同事物的结合，是事物量的增加和质的重复。两者价值的高下显而易见。可见，“和”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的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一种勇敢的同时也是理智的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一种敢于自我扬弃的与时俱进的品质，一种斗争的艺术和制胜的法宝。

儒家文化还崇尚创新变化。尚变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之一。《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这样一句诗：“高岸为谷，深谷

^① 《论语·子路》，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为陵。”这是大自然的变化在人的心目中的反映。《周易·系辞下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告诉人们，一切事物到了顶点之后，必将发生新的变化，变化了就能通畅，通畅了就能长久。这是亘古不易的道理。所以，天道尚变，人道同样也就尚变，这就叫“穷则思变”。这里的“穷”并非指贫穷，而是指一种道理、秩序已经完全老化，再也没有新鲜东西和方法了。也就是无路可走，走不通的情况。因此，必须适时应变，换成今天的话说则是“与时俱进”。

这种通变思想孕育出中华民族尚变的民族精神。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改革家最多的国家，这乃是“生生之谓易”的民族精神使然。^①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的发展变迁史。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②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尚变是其相沿不断的艺术精神。从秦代的李斯、程邈，中经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乃至清代的郑板桥和谢世不久的沈尹默、于右任诸先生，没有一个不是书坛上求变创新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所以，晚唐僧人书法家亚栖在《论书》中总结说“凡书通则变”。认为，如果没有创新，即使能入石三分，也只能叫做“书奴”，可谓形象至极。

又比如，佛教能够“中国化”，除了前面说的中国人的“和”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的作用外，更多的还在于“尚变”的民族精神使然。佛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与孝、忠、入世这三个中国人固有的观念相抵触。而要消除这些抵触，最关键的就是变抽象的本体论为心本体论。禅宗六祖慧能提出“心即佛”的观点，就是把佛性归结为现实的人性，明

① 《易·系辞上传》，[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第57页，见《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白白自身本具佛，自性本来是佛，也就悟道了。这样，印度的佛教就中国化了。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许多灿烂一时的文化后来都中断了，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断残的文化遗骸供后人凭吊。如古埃及文化、古玛雅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爱琴文化等，它们并非不先进，但是都消灭了。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后来也中断了。反观中华文化，没有因外在原因截然中断，即使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之下，中国人民也没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英勇斗争，赢得了独立，也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其实，这并不是中华文化特别顽固。中国地大，人多，不易征服，固然是一种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是中国人民不断的望新图存，也就是“尚变”的民族精神支撑了中华文化代代相传，永不衰竭。这种“尚变”的精神，促使着中国人不断地扬弃旧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不断学习吸收别人的先进东西，不断发扬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

中和、创新这两种儒家思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和往往意味着创新，但创新不等于中和。显然，儒家文化追求的是中和基础上的创新，而非一味的生新怪变，这从“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可以窥见儒家的价值追求。

由上可知，尚和、贵中、求变作为儒家的主要思想，几千年来已升华为我们民族的主要精神，积淀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规范和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对我们民族独特的生存与发展道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不可否认，中国在人类历史的较长时期都是经济、文化非常

^① 《论语·述而》，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发达的国家，对人类的文明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近代的中国落后了。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偌大的东方帝国，成了西方列强争相瓜分的对象，一个长达2000多年的强大的封建王朝被沦为半殖民地。这种民族灾难使得无数的中国先进分子走上了救亡图存的民族振兴之路。他们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希望能从根本上引进一种能使中国摆脱落后与挨打状态的主义和学说。林则徐、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虽然向西方学了不少东西，但是拿回中国，总行不通，总免不了失败的厄运。即使像孙中山这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提出了三民主义这个在那一时代最具进步性的思想，并且领导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最终还是失败了。1917年，俄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从此，俄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觉醒，让他们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为之奋斗的光辉事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并且得到检验的毛泽东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引进中国，这是中国人“穷则思变”思想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夜”，那时的中国确实不堪回首。如前所述，中国已经被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是世界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国家之一。面对这样的悲惨命运，觉醒的中国人那颗被掩藏的不甘落后，不甘挨打，不甘被奴役的民族自尊心和创新求变的民族精神被激活了，他们发愤图强，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们向西方学习，这亦是我们民族尚“和”精神的反应，它表明，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是开放的，是敢于承认自

己的差距并勇于向别人学习的。无奈，限于时代的局限和这批先知先觉们的个人局限，他们还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救人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的济世良方。

十月革命虽然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马列主义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她不可能直接提供解决各国革命或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仅仅提供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中国的民族智慧，那就是“中庸”的民族智慧。也就是要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通变”的思想。而这样的思想，说来简单，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就拿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的十多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曾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一度几乎陷入绝境。显然，这是一种“同而不和”，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和盲目的“拿来主义”，所以，注定要失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同上述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显示了他作为民族伟人的民族智慧。他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一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使中国革命的航船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方向破浪前进；另一方面，他又不拘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更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条条，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正是“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即“中和”的思维方式。由于毛泽东同志有这样的个人和民族智慧，有“执两用中”的理性思辨，不走极端，故能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开创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突破口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则，为殖民地